

創傷知情與修復式司法 在兒少工作的運用

賴月蜜

壹、認罪文化

傳統的刑事制度，也包括少年刑事審理，都是以犯行認罪為優先，犯了錯，首先就是要行為人承認錯誤，一如宮口幸治（2019）在其著作《不會切蛋糕的犯罪少年》所說，許多犯罪少年其實對犯行是沒有認知的，只是在大人的世界裡，一直要他們承認錯誤，但他們的理解能力和認知，有時並不了解他們到底犯了什麼錯，所以他們的錯誤會一再產生，他們不斷透過「問題行為」發出「求助訊號」，也在挑戰大人看見了嗎？（陳令嫻譯，2020）所以針對他們為什麼會有問題行為，創傷知情和修復式司法，都是從了解行為人的成長脈絡為出發，讓所謂的加害人有機會把自己心裡的想法「說」出來，讓內在的想法和委屈得以釐清，如此，他們才有能力去了解自己對別人造成的傷害，才能真正負起責任，達到修正行為、改變的

可能。因此，本文就創傷知情（Trauma Informed, TI）、修復式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 RJ）的概念，從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CRC）的內涵及意見書，對照英國及臺灣運用在兒少工作的發展，也從本人實務工作加以驗證論述之。

貳、創傷知情

Herman（2018）提到人們對於創傷的認識，從最早的戰爭創傷—砲彈驚恐症（shell shock）、歇斯底里（hysteria）、嚴重精神官能症（great neurosis），到創傷症候群（traumatic syndrome）及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強調各種不同的創傷，可能帶來明顯或潛在的傷害。創傷可能源於童年，因為出生的不可選擇性與脆弱性，本於人類的自我防衛機轉，即使小小的孩子

對於暴力與衝突，也可能出現戰（fight）或逃（flight），甚至解離凍僵（freeze）的回應，因此Bessel van der Kolk醫師提出了「心靈的傷，身體會記住」（The Body Keeps the Score）（Klok, 2017），而童年逆境經驗（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 ACE）也成為我們在瞭解一個人行為形成的重要指標。

所謂童年逆境經驗，係指在童年時期歷經不當對待或創傷，例如：父母／照顧者對其情緒虐待、肢體暴力、性虐待、疏忽；同住者有藥物濫用、心理疾病；母親受暴力對待；父母離婚或分居；家人入獄等情況。近年越來越多童年逆境經驗的影響研究，長期研究具有童年逆境經驗的孩子，在其成長歷程累積的壓力，不是向內退縮、傷害自己，就是向外攻擊別人、甚至有犯罪行為。研究也顯示有ACE者，因為創傷及壓力反應會影響內分泌系統、大腦系統，以及免疫系統，罹患冠狀心臟病、中風、糖尿病、癌症、肺病的機率高於一般人，壽命減少，不僅有健康受影響，在就業、犯罪、教育、生活環境和接受當地服務上都有不利因子存在（Lewer et al., 2020）。因此，如何改善及調整童年逆境的傷害，「創傷知情照護」（trauma informed care）因應而生，益顯重要而迫切。從童年逆境經驗到創傷壓力症候群的認知，創傷的核心經驗是在於喪失權能（disempowerment）和

失去連結（disconnection），因此，在創傷知情照護，從理解（realize）創傷、辨認（recognize）創傷、回應（respond）創傷、到防止再受創傷（resist re-traumatization），而創傷到復原，重構復原的三階段，第一階段，恢復安全感、建立信任關係；第二階段，回顧與哀悼；第三階段，重建自我和社群的連結（Kolk, 2017; Herman, 2018）。

Harris與Fallot（2001）也提到創傷知情，可視為一種照顧典範的轉移，在不同的場域，提供社會關懷照顧服務，為經歷創傷的受服務對象創造更多復原的機會，因此，工作者不僅要知曉創傷，更重要的是協助復原。而所謂創傷知情法庭（Trauma-Informed Court），係指將創傷知情的概念運用在司法系統，法院系統的任務確實很複雜。法律體系的任務是保護社會、保護兒童及其家庭，追究加害者的責任，同時協助他們康復，故前來法庭即可能帶有創傷事件，不論其為關係人、證人或被告等身分，倘法庭人員多一些觀察、關心、瞭解，都有助其情緒穩定及更能陳述，更期待在這過程得到創傷復原的可能（Evans & Graves, 2018; Oudshoorn, 2016）。Oudshoorn（2016）也從ACE的角度，強調許多犯罪少年也經歷童年逆境，因自小的憤怒壓力累積，致向外攻擊而觸法，故從創傷知情理論，告訴我們兒少之所以犯罪，正因為他們曾經

或正在受傷中，運用創傷知情方法以療癒（healing）、堅毅力（resilience）和修復式司法的原則，協助犯罪少年及預防犯罪，創傷知情照顧更是要預防及終止暴力的循環（陳秀靜、賴紅汝，2021；Oudshoorn, 2016）。

美國Multnomah County法院自 2015 年以來，與 Trauma Informed Oregon 合作創傷培訓相關的活動，為法官提供專業訓練，在創傷知情的認知下，強調法官在審理時和當事人的眼神接觸（eye contact），放鬆身體（relax body），適當的聲音語調，都有助促進當事人的注意力和減少焦慮，使當事人有更多的法庭參與（Mason, 2019）。美國許多法院系統已認同創傷與治療的重要性，除加強法庭工作人員的自我照顧外，針對法庭的參與者即是創傷倖存者，要求司法人員對創傷應有理解和認知，創造安全的法庭環境，讓當事人在有安全感、受到尊重的溝通陳述下，則法庭的參與對他們而言，不再是壓力與威脅，創傷倖存者也能從司法的介入中，得到減緩創傷的可能（Hora, 2021）。

參、修復式司法

修復式司法即是在一個特定的犯罪事件中，利害相關的人聚集在一起，討論與因應如何處置該犯罪後果的一種過程。

修復式司法強調在犯罪發生後，被害人（victim）、加害人（offender）與社區主動參與譴責犯罪行為、要求加害人負起責任、補償被害人與社區、以及使加害人復歸社會解決衝突的過程。修復式司法的價值主要在更關注被害人和社區的修復（restoration），而非僅對加害人進行更昂貴的懲罰（punishment）（Umbreit, 2001）。Moore（2022）進一步提到，相較於關注違反法律，修復式司法對於破裂的關係更加重視，以實現道德和社會的修復，產生積極的心理影響，而關鍵也在損害賠償，透過安全的面對面對話，期望達成協議（Moore, 2022）。

修復式司法運用在矯治實務（correction practice），強調以往被害人很難有機會表達他們自己的想法，及他們認為加害人應該受到怎樣懲罰的意見，矯治工作的主要個案也以加害人為主。修復式司法的被害人與加害人調解（Victim- Offender Mediation, VOM），納入被害人的參與使其有發聲機會，朝向衡平被害人與加害人之利益（balancing the interests of victims and offenders），促使其達成雙方皆可接受及滿意之協議（盧映潔，2005；Owen & Richards, 2002）。故修復式司法即在修補因犯罪所造成的損害，將因該犯罪而受影響的人聚集一起，一起決定該如何處理該犯罪行為，而對話（dialogue）、賠償（reparation）、

負責任（accountability）為修復式司法最重要的內涵（Bradshaw & Roseborough, 2005; Umbreit, 2001; Williams-Hayes et al., 2004）。

被害人與加害人調解在各國的實行，多以少年犯罪為優先推行，調解對於少年非行的行為，強調司法非萬能，提供一個非司法判斷的方式，遵行修復式司法與人性化司法（humanizing of the justice system）的概念，引導少年加害人瞭解其不當行為所造成之傷害，提供被害人與加害人面對面（face to face）溝通調解的機會，使被害人可以說出受害，表達其受補償想法，協議出雙方都可接受之補償協議（Bradshaw & Roseborough, 2005），使被害人的情緒得以舒解及損害得以補償，再令加害人瞭解其行為所造成他人之損害，確實負其責任，使其學習尊重與負責（Flash, 2003）。被害人與加害人調解對雙方都有增權（empowerment）的效果，雙方透過調解委員的帶領，可能可以激發他們有創意（creative）的解決方式，他們的補償計畫可能包括金錢賠償、社區服務、諮商或其他處遇（Flash, 2003）。

許多國家已採用修復式司法的理念在司法爭議的事件，修復式司法的模式，除了上述「被害人與加害人調解」最普遍運用外，還有「家庭團體會議」（Family Group Conference）、「審判圓形會議」（Sentencing Circle）（Presser

& Hamilton, 2006）。Hayden & Gough（2010）表示，修復式司法的廣為運用在處理衝突的方法，衍然已經成為修補傷害（repair harm）降低衝突（reduce conflict）及和諧公民社會（harmonize civil society）的全球社會運動（global social movement）（Hayden & Gough, 2010）。

肆、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

1967年美國最高法院通過Gault法案，使兒少在法庭中享有和成人一樣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且兒少基於本身之特殊性，應享有與成人不一樣的法律程序保障（Scherr, 2001）。1989年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註1）及第40條（註2）明文保障兒童在司法程序中，所應受到的保護。2007年第44屆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在日內瓦提出了兒童權利公約第10號一般性意見書（註3），輕微罪行行為，包括初犯兒童，處置此類罪行不訴諸刑事司法法庭審判，而修復式司法屬於不訴諸司法審理的干預措施，少年司法應推行轉向和修復式司法等替代措施，提供觸法兒童可採用的有效方式，不僅有助於觸法兒童的最佳利益，而且有利於社會利益，家長、社區應全面促進和協助兒童，也符合《兒童權利公約》第40條第1款所列的原則。倘進入司法程序，依《兒童權利公約》第12

條第2款規定，兒童司法表意權，兒童應當有機會在影響到兒童的任何司法和行政訴訟中，以符合國內法訴訟規則的方式，直接或通過代理人或適當機構陳述意見。

《北京規則》第14條規定，訴訟應當在諒解的氣氛中進行，以便使兒童能夠進行參與並自由地表達意見。在陳述意見部份，從創傷知情法庭及修復式司法的問句，才更能夠讓刑事案件中的兒少，慢慢地說出來，而不是一味的自我防衛，不說話或抗拒。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10號一般性意見書已納入修復式司法於少年犯罪處遇及預防，因為傳統在回應少年犯罪之刑事政策以應報司法（retributive justice）及更生司法（rehabilitation justice）為主，一則重在適當的懲罰，一則重在觀護處遇，惟二者皆以加害人為主，而忽略被害人之需求，故修復式司法的觀點運用在矯治實務（correction practice），強調以往被害人很難有機會表達他們自己的想法，及他們認為加害人應該受到怎樣懲罰的意見，矯治工作的主要個案也以加害人為主。修復式司法與更生的概念，透過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10號一般性意見書，突顯人權之演進，以國際觀點主張社會民主、社區責任，重建少年刑事司法制度（Muncie, 2005）。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強調轉向（diversion）及修復式司法，都是減少少年累犯的友善司法（Child-Friendly

Justice）作為（Newell, 2015）。

伍、創傷知情與修復式司法在英國兒少工作的發展

英國1933兒童及少年法（the Children and Young Person Act 1933），針對微罪的少年，即有社福轉向的概念，經由社區社工協助，聯結社區資源，使少年有責任感、歸屬感，提升其解決問題的能力，遠離犯罪，避免太早進入司法，而累犯不斷。除福利概念外，1969兒童及少年法（the Children and Young Person Act 1969）也加強保護理念，對犯罪少年、虞犯少年為多元處遇，從「保護程序」（care proceeding），確立「保護程序優先於刑事程序」的原則（Vernon, 2001）。

1998年犯罪及擾亂治安法（the Crime and Disorder Act 1998）和1999年少年司法及刑事證據法（The Youth Justice and Criminal Evidence Act 1999）為英國在少年司法體系中的重要變革，英國政府認為少年犯罪的革新「沒有任何藉口」（no excuses），1999年少年司法和刑事證據法即採用「修復式司法」的概念與實務，主要意涵有一、修復（restoration）：少年為犯行道歉，彌補傷害。二、歸復（reintegration）：少年重返其社區生活。三、責任（responsibility）：少年

及其家長要面對其行為負起責任，強調雙親家長之責任，預防再犯（Hayden & Gough, 2010; Vernon, 2001）。

1998犯罪與擾亂治安法規定，當地社會福利及教育主管機關有責任整合警政、觀護及健康單位，成立跨機構的少年犯罪矯治團隊（Youth Offending Teams, YOT），達預防少年及兒童犯罪之目的（Watson, 2001）。依據2000刑事司法及法院服務法（Criminal Justice and Court Services Act 2000）建制之「跨機構公眾保護團隊」（Multi-Agency Public Protection Arrangements, MAPPA），旨在結合警方、感化服務部門、監獄部門及其他機構，以識別、評估及管理由嚴重暴力犯罪行為及性侵害犯罪所帶來的風險（Youth Justice Board, 2010），亦適用於重罪及性犯罪之少年，影響後續少年犯罪矯治團隊（YOT）之工作，另外，該法令強調少年社區裁定（youth community order）（Youth Justice Board, 2006），著重跨領域合作工作模式。

另外，在傳統少年刑事訴訟程序上，從逮捕、拘提到訊問、收容，這些司法程序都容易使已經受創傷的兒童再次受到創傷或加劇他們的創傷經歷，違背保護所有兒童免受傷害的原則，不符合兒童最佳利益（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因此，英國少年司法進行全面變革，採納創傷知情的思維，以評估服務及刑事司法程

序歷程（包括逮捕、量刑和干預），並考慮對工作人員團隊本身的影響（Silvester, 2022）。

從1980年代開始英國將修復式司法運用在司法上的成效，具體的降低被害人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減少被害人對報復的渴望，也減少相關刑事成本的支出，例如再犯的減少（Moore, 2022）。將創傷知情的思維，納入在少年犯罪的預防及處遇，是突破傳統少年刑事政策上單一的犯罪審判，轉向對兒少及其家庭的輔導協助工作（Silvester, 2022）。在預防少年犯罪部分，因為高比例的少年犯，曾接受過當地主管機關的監護（in care）（Timms, 2001），故英國政府在預防少年犯罪部份，也從安置照顧著手，從處遇到預防，創傷知情的照顧也運用在安置機構兒少的行為問題處遇（Hayden & Gough, 2010），因為依英國衛生部2012年的報告，有心理健康問題、濫用藥物、具攻擊性行為、受政府監護、生活貧困的兒童，在刑事司法系統中占高比例（Department of Health, 2013）。

英國已將修復式司法推向更預防的前端，長期在各地校園宣導及推動和平教育運動（Peace Education Movement），同儕調解（peer mediation）主要是學生間的紛爭，由訓練的學生擔任調解委員，以客觀中立的第三者協助衝突的雙方，達成協議以解決同儕間的衝突紛爭（Cremin,

2007; Gilhooley & Scheuch, 2000)。同儕調解在學校場域已經逐漸受到重視及採用，而其受到歡迎的主要原因係在學校場域提供一個無威脅性的學習方式，讓孩子學習到如何解決衝突，不論他們是經由擔任調解委員的角色或是使用調解過程的學習（Cremin, 2007）。故英國少年法在處遇少年犯罪部份，已跳脫處罰及殘補的概念，更往前走向預防及教育、矯治的層次，期待從預防部份做起，更是從小做起。從學校、家庭、社區，推廣修復式司法概念以處理衝突，在學校場域也以同儕調解或對話圈、被害人與加害人調解等方式，協助學生問題解決，增加公民參與及建立法治精神，也相對地，減少了校園霸凌及少年犯罪之發生。

陸、創傷知情與修復式司法在臺灣兒少工作的發展

臺灣在1963年公布少年事件處理法，為少年保護及少年犯罪的特別法，有別於成人犯罪的實體法和程序法，因犯罪對象為少年，有別一般刑法與刑事訴訟法。少年事件處理法，於1997年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法，納入轉向處遇，就情節輕微而不付審理或不付保護處分的情況，則轉介兒童及少年福利或教養機構為適當之輔導（少事法第29條第1項），或是少年法院在裁定保護處分部份亦得裁定諭知交付安置於

適當之福利或教養機構輔導（少事法第42條第1項第3款）；針對轉向的部份，除上述少年事件處理法的規範外，2003年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45條亦進一步規範，針對依少年事件處理法所轉介或交付安輔之兒童及少年及其家庭，當地主管機關應予以追蹤輔導，並提供必要之福利服務。

少年事件處理法2019年修法，依據CRC的精神，就輕微罪行行為，包括初犯兒童，得不訴諸刑事司法法庭審判干預，而採轉向替代措施，少年事件處理法第29條第1項，少年法院依少年調查官調查之結果，認為情節輕微，以不付審理為適當者，得為不付審理為適當者，得為不付審理之裁定，並為下列處分：一、告誡。二、交付少年之法定代理人或現在保護少年之人嚴加管教。三、轉介福利、教養機構、醫療機構、執行過渡性教育措施或其他適當措施之處所為適當之輔導。因此在轉向制度上，也再進一步針對不付審理之少年，擴大轉向之社會福利機構，也增加醫療機構、執行過渡性教育措施或其他適當措施之處所為適當之輔導。在安置輔導部份的轉向措施，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42條，也擴大可轉向之機構，即可交付安置於適當之福利、教養機構、醫療機構、執行過渡性教育措施或其他適當措施之處所輔導。

法務部從2009年開始推動修復式司法而努力，建構被害人—加害人—社群成員

間對話機制，以修復犯罪造成之傷害與破裂關係（法務部，2009）。但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27條（註4），會進入地檢署的案件，都屬重罪，能適用修復式司法的機率小，終於少年事件處理法2019年修法，依據CRC的精神，納入修復式司法的精神，讓少年確實知錯，向被害人道歉，負起責任，也從創傷知情，協助關係療癒，少年事件處理法第29條第2項即明文規範納入修復式司法的作為：「少年法院得斟酌情形，經少年、少年之法定代理人及被害人之同意，轉介適當機關、機構、團體或個人進行修復，或使少年為下列各款事項：一、向被害人道歉。二、立悔過書。三、對被害人之損害負賠償責任」。所以，臺灣現階段法庭實務，創傷知情法庭及修復式司法概念已開始運用在少年犯罪、少年非行，以降低少年犯罪的發生。少事法新修訂也納入了英國、聯合國的網絡合作概念，在少年事件處理法第42條第5項，少年法院為第一項裁定前，認有必要時，得徵詢適當之機關（構）、學校、團體或個人之意見，亦得召開協調、諮詢或整合符合少年所需之福利服務、安置輔導、衛生醫療、就學、職業訓練、就業服務、家庭處遇計畫或其他資源與服務措施之相關會議。

如何具體操作修復式司法的進行，國際修復式司法學會（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Restorative Practices, IIRP）提

出當加害人事情出錯時（When things go wrong……）的五個問句：

- （一）發生什麼事（時、地）
（What happened?）
- （二）當時想了什麼（What were you thinking of at the time?）
- （三）從事情發生到現在又想了什麼
（What have you thought about since?）
- （四）這件事對哪些人發生什麼影響
（Who has been affected by what you have done? In what way?）
- （五）你覺得怎麼樣可以讓事情變得
好一點（What do you think you need to do to make things right?）（註5）

本人曾擔任臺灣某少年觀護所，數名少年與中年人傷害致死事件之修復式司法團體之團體帶領者，第一次與這幾位少年個別會談，即運用上述修復式司法五個問句，在這五個問句來來回回，從每個人的回應，了解事件發生的全貌。例舉如下：

問題1：「你可以談談那個晚上，發生什麼事了？」

其中一人回答：「因為過年，我們一群人在○○家慶祝過年，後來，○○的弟弟打電話來說，他在外面遇到麻煩，所以我們一群人就衝出去救人了」。

問題2：「在事情發生的當下，你想了什麼？」

其中一人回答：「我不認識那個人，那天晚上很晚了，我們也都喝酒了，我們一群人衝過去就打，當時很混亂，當時，真的什麼也沒想。」

問題3：「從事情發生到現在，你又想了什麼？」

其中一人回答：「自從來到少觀所，每天晚上睡覺，我都夢到那個人的臉。」

問題4：「這件事，對你還有哪些人，發生什麼影響？」

其中一人回答：「我很抱歉對於對方家庭的影響，小孩沒有了爸爸，太太沒有了先生。對於我的家庭也是，爸爸一直在籌錢，媽媽整天哭，而我現在也只能在這裡。」

問題5：「你怎麼想如何可以讓這些影響變得好一點？」

其中一人回答：「我會努力遵守在這裡的生活，希望可以早一點出去，完成學業或工作，我希望可以趕快賺錢，給我爸媽，有能力也寄錢給對方小孩。我也希望可以早點成家立業。」

透過開放式問句，這五個問句為何能讓國、高中生說出心中的想法，主要是這五個問句，不批判，不指責，讓所謂的行

為人有機會陳述事件始末，有機會表達他們的感受，也可以思索這件事對他們及別人的影響，慢慢有正向思考，最終能負起責任。後來進行五次團體，在團體進行至尾聲前，我也邀請少年父母的各別會談，主要讓父母瞭解少年目前正向的改變，不論如何，少年終究會歸復社區，父母家庭是少年最大的支柱，鼓勵父母親在少年返家後，持續對少年的關愛，提醒他們與少年互動，在教養上要適當放手，但永不放棄。

被害人與加害人調解，本人也曾運用IIRP修復式司法五個問句在安置機構少年間的衝突，惟事件中有所謂行為人，也有被害人，故本人再加上IIRP修復式司法對被害人的四個問句（When someone has been harmed……）

（一）當時你怎麼意識到事情的發生
（What did you think when you realized what had happened?）

（二）這件事對你及哪些人發生什麼影響（What impact has this incident had on you and others?）

（三）對你最困難的是什麼（What has been the hardest thing for you?）

（四）你覺得怎麼樣你會好一些
（What do you think needs to happen to make things right?）

(註6)

依數位少年各別狀況，從修復式司法問句為個別會談，協助他們緩減壓力及情緒，慢慢陳述事件，少年有些在會談時，不易表達，也以回家功課方式，讓他們再想想，下次繼續討論，待評估少年們的準備情況妥適後，才安排他們面對面對話，提供他們對彼此，表達想法，道歉及感謝的機會，以化解紛爭。數月後，機構社工告知少年們後續的表現良好，也印證了創傷知情的重要，給予兒童說出心中想法的重要性，非僅懲罰，使其更退縮或暴力。

創傷到復原的概念，第一步為安全感，而安全感則為呼吸、正念、運動（Klok, 2017），本人也曾運用安全感再獲得，協助安置機構有攻擊暴力的孩子，進行睡前儀式，睡前深呼吸、先正向思考，再感謝今天發生的所有人事物，最後祈禱祝福，協助其身心靈平靜，睡個好覺。這些安全感元素的靈活運用，都可以使帶「傷」來安置機構的孩子，「傷」能被看見、被撫慰，而減少其暴力行為。

從預防少年犯罪角度，本人從法院家事調解、社區家事商談的調解技巧，學習英國少年犯罪的預防，也進行操作數個同儕調解團體，透過調解技巧的學習，角色扮演、同理、傾聽、調解演練，許多的分享討論，從兒童在課堂操作演練，到現實生活中暴力減少，可謂「說的出來的孩子，拳頭不會來」，真的有減少兒少霸凌

及衝突的可能。

臺灣現階段法庭實務為何？2023年，司法院「友善兒少司法研究」及「友善兒少出庭工作手冊」，共訪問 47位實務工作者（有法官、司法事務、法官助理、書記官、執達員、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律師、司法詢問員、社工等），透過質性訪談分析其正向、負向的法庭經驗，研究結論，臺灣法庭已開始關注著重創傷知情法庭及兒童友善司法，對於來法庭兒童，創傷的認知，審理過程中對兒少友善的訊問一同理心、尊重及傾聽，用白話簡單的口語方式與兒少互動，降低兒童法庭創傷，創造更友善的法庭環境，司法院也將創傷知情法庭納入相關訓練課程，也強調對司法人員本身的創傷知情及自我照顧（賴月蜜、李姿佳，2023）。

柒、小結——活用所學，到自我照顧

在處理父母離婚的實務經驗中，我曾經遇到將小孩屁股打得通紅的家長，只為了要小孩誠實，承認偷了東西，在家長嚴加拷打後，小孩從死不認錯到最終點頭認罪，家長立刻帶小孩吃大餐，這樣的歷程，孩子到底學習了什麼？在和家長溝通的過程裡，我從不當管教的目的、手段、結果和家長討論，我說從管教的目的，我百分之百支持這個家長教育孩子，我

們要誠實、不能拿不屬於我們的東西，但是從手段和結果都是我沒有辦法接受的。因此，我請家長用手機google「ACE」，家長抬起頭來，提及自己也是屬於ACE的小孩，我再以「創傷知情」角度，讓家長理解父母離婚的衝突，對孩子身心造成的傷害，家長抗拒憤怒的情緒，慢慢鬆動，家長也理解認知到，孩子看到暴力、吃了暴力，暴力內化後，當遇到超出「身心容納之窗」的情境時，很自然的使用暴力回應，大人如果也有童年逆境經驗，如果不能理性調整自己的情緒，在管教子女上，很容易也會用暴力體罰的行為產生。進一步，孩子為什麼拿了不屬於他的東西，我用「修復式司法」的問句、和家長做討論，我也告知《民法》第1085條父母得於必要範圍內懲戒其子女，「懲戒權」未來可能的修法（註7），簡言之，未來父母對子女的管教強調零體罰，即父母不得對子女為身心暴力行為，故大人如何調整自己過往的創傷，也能以創傷知情的角度看待孩子的犯錯，未來的親職溝通，才能更和諧，也能成就彼此。

「學習新知，讓我們更有力量」，不論從研究或個人實務經驗，在在應證少年的偏差行為深受少年的童年逆境經驗影響，而創傷知情理論的提出，更是提醒實務工作者不要從行為結果論來單一批判，僅從行為判刑，又回到傳統應報主義，以暴制暴，回到暴力的循環，再犯罪的情況

更嚴重，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工作會永遠在補破洞。創傷知情理論的精神，相當人性與慈悲的從一個人的生命歷程探究，Why？Why？Why？為什麼會犯罪，一個人的出生不同選擇及其脆弱，更要著眼其過往的成長史，這是對一個人最深刻的關切，實務工作者不論從社工或司法的角度，在其對行為人的瞭解知悉後，專業的展現是要協助其從創傷走到復原，因此，復原要有方法，而在復原之路與刑事審判之路同時併進之時，修復式司法有了最好的協助，透過修復式司法不批判的問句，一步步的給予行為人有機會說出來其內在的想法，給予行為人從其自身的角度，協助其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對他人造成的傷害，他如何讓這傷害的結果可以變得好一些，他可以如何負起責任，彌補對他人或社區所造成的傷害，回到他自身的覺察反省及負責，這是一個人性修補與生命改造的工程，事實上在工作過程著實不容易，因為社會工作強調的是生命影響生命，我們如何真正走入他人的生命經驗，在我們面對到少年的偏差行為及其童年逆境時，在社會工作介入的過程，也在考驗著工作者自己的堅強程度，所以，創傷知情也強調工作者的自我照顧，時時觀照自己，調整照顧自己，工作者的自我照顧一如高樓工程的完成，要有良好的建築機具，而機具的維修，更是要定期，確保施工的品質，因此，自我照顧是我們在助人工作上

最重要的「事前準備」。

關鍵詞：創傷知情、童年逆境經驗、修復式司法、創傷知情法庭、兒童最佳利益

（本文作者為慈濟大學社會工作學系退休副教授）

註 釋

- 註1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一）締約國應確保有形成其自己意見能力之兒童有權就影響其本身之所有事物自由表示其意見，其所表示之意見應依其年齡及成熟度予以權衡；（二）據此，應特別給予兒童在對自己有影響之司法及行政程序中，能夠依照國家法律之程序規定，由其本人直接或透過代表或適當之組織，表達意見之機會。
- 註2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40條：締約國對被指稱、指控或認為涉嫌觸犯刑事法律之兒童，應確認該等兒童有權獲得符合以下情況之待遇：依兒童之年齡與對其重返社會，並在社會承擔建設性角色之期待下，促進兒童之尊嚴及價值感，以增強其對他人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 註3 <https://www.cylaw.org.tw/about/crc/28/141>。
- 註4 少年事件處理法第27條：少年法院依調查之結果，認少年觸犯刑罰法律，且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以裁定移送於有管轄權之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一）犯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二）事件繫屬後已滿二十歲者。除前項情形外，少年法院依調查之結果，認犯罪情節重大，參酌其品行、性格、經歷等情狀，以受刑事處分為適當者，得以裁定移送於有管轄權之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前二項情形，於少年犯罪時未滿十四歲者，不適用之。
- 註5 資料來源：<http://www.iirp.org>。
- 註6 資料來源：<http://www.iirp.org>。
- 註7 《民法》第1085條：「父母得於必要範圍內懲戒其子女。」修正草案版本：「父母保護及教養未成年子女，應考量子女之年齡及發展程度，尊重子女之人格，不得對子女為身心暴力行為」。

參考文獻

- 法務部（2009）。98年法務部施政成效暨未來努力方向－法務部業務報告。立法院第7屆第4次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全體委員會議資料。
- 宮口幸治（2020）。《不會切蛋糕的犯罪少年》（陳令嫻譯）。遠流。（原著出版年：2019）
- 陳秀靜、賴紅汝（2021）。〈創傷知情實務於美國少年司法的運用－兼論於臺灣的適用性〉。《社區發展季刊》，174，257-269。
- 盧映潔（2005）。〈犯罪被害人保護在德國法中的發展－以犯罪被害人在刑事訴訟程序中的地位以及「犯罪人與被害人均衡協商暨再復原」制度為探討中心〉。《台大法學論叢》，34（3），165-276。
- 賴月蜜、李姿佳（2023）。《友善兒少出庭工作手冊》。司法院。<https://jirs.judicial.gov.tw/judlib/EBookQry04.asp?S=V&scode=V&seq=20>
- Bradshaw, W., & Roseborough, D. (2005). Restorative justice dialogue: The impact of mediation and conferencing on juvenile recidivism. *Federal Probation*, 69(2), 15-21.
- Bruce D. P. & Oprah, W. (2022)。《你發生過什麼事——創傷如何影響大腦與行為，以及我們如何能療癒自己》（康學慧譯）。悅知。（原著出版年：2021）
- Cremin, H. (2007). Peer mediation: Citizenship and social inclusion Revisited (3rd ed.). Open University Press.
- Department of Health. (2013). Annual report of the Chief Medical Officer 2012, our children deserve better: Prevention Pays. Department of Health.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media/5a7ba6ea40f0b645ba3c5b39/2901304_CMO_complete_low_res_accessible.pdf
- Evans, C., & Graves, K. (2018). Trauma among Children and Legal Implications. *Cogent Social Sciences*, 4, 15446791. <https://doi.org/10.1080/23311886.2018.1546791>
- Flash, K. (2003). Treatment strategies for juvenile delinquency: Alternative solutions. *Child & Adolescent Social Work Journal*, 20(6), 509-527.
- Gilhooley, H., & Scheuch, N. S. (2000). Using peer mediation in classrooms and schools- Strategies for teachers, counselors, and administrators. Corwin.
- Lewer, D., King, E., Bramley, G., Fitzpatrick, S., Treanor, M. C., Maguire, N., Bullock, M., Andrew Hayward, A., & Story, A. (2020). The ACE index: Mapping childhood adversity in England.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42(4), 487-495.
- Harris, M. E., & Fallot, R. D. (2001). *Using Trauma Theory to Design Service Systems*. Jossey-Bass.
- Harris, N. B. (2018)。《深井效應：治療童年逆境傷害的長期影響》（朱崇旻譯）。究竟。（原著出版年：2018）

- Hayden, C., & Gough, D. (2010). *Implementing restorative justice in children's residential care*. Policy.
- Herman, J. (2018). 《從創傷到復原：性侵與家暴倖存者的絕望與重生》（施宏達、陳文琪、向淑容譯）。左岸。（原著出版年：2011）
- Hora, P. (2021). *Handbook for Judicial Officers: Therapeutic Jurisprudence and the Trauma-Informed Court*. https://www.judcom.nsw.gov.au/publications/benchbks/judicial_officers/trauma_informed_courtroom.html
- Kolk, B. (2017). 《心靈的傷，身體會記住》（劉思潔譯）。大家。（原著出版年：2014）
- Mason, S. (2019). *Trauma informed care within the judicial system*. JCIP Model Court and Training Analyst, Juvenile Court Programs Division, Oregon Judicial Department. <https://traumainformedoregon.org/trauma-informed-care-within-the-judicial-system/>
- Moore, E. (2022). Trauma and restorative justice. In P. Willmot & L. Jones (Eds.), *Trauma-Informed Forensic Practice* (pp. 396-412). Routledge.
- Muncie, J. (2005). The globalization of crime control: The case of youth and juvenile justice: Neo-liberalism, policy converg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Theoretical Criminology*, 9(1), 35-64.
- Newell, P. (2015). It is not child-friendly to make children criminals. In S. Mahmoudi et al. (Eds.), *Child-Friendly Justice- A Quarter of a Century of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pp.137-150). Brill.
- Oudshoorn, J. (2016). *Trauma- Informed Juvenile Just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CSPI.
- Owen, L., & Richards, D. (2002). Social Work and Correction Practice. In Swain, P. A. (Ed.), *In the Shadow of the Law: The Legal Contest of Social Work Practice*. Federation.
- Presser, L., & Hamilton, C. A. (2006). The micropolitics of victim: Offender mediation. *Sociological Inquiry*, 76(3), 316-342.
- Scherr, M. I. (2001) Child Welfare Service Development in U.S.A. In整合與成長—二十世紀非營利組織與兒童福利國際研討會，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
- Silvester, N. (2022). Developing trauma-informed youth justice service. In P. Willmot & L. Jones (Eds.), *Trauma-Informed Forensic Practice* (pp. 333-347). Routledge.
- Umbreit, M. S. (2001). *The Handbook of Victim Offender Mediation: An Essential Guide to Practice and Research*. Jossey- Bass.
- Vernon, S. (2001). Account of a magistrate who sits in the Youth Court. In Cull, L. A. and Roche, J. (Eds.), *The Law and Social Work: Contemporary Issues for Practice*. The Open University.
- Youth Justice Board. (2010). *Multi-Agency Public Protection Arrangements (MAPPA) Guidance for Youth Offending Teams*. Youth Justice Board.
- Youth Justice Board. (2006). *Criminal Justice Act 2003: 'Dangerousness' and the New Sentences for*

Public Protection Guidance for Youth Offending Teams. Youth Justice Board.

Watson, H. (2001). Partnership in action: The new challenge of the Youth Justice reforms and youth offending teams. In Cull, L. A. & Roche, J. (Eds.), *The Law and Social Work: Contemporary Issues for Practice*. The Open University.

Williams-Hayes, M., Dulmus, C. N., Nugent, W. R., & Sowers, K. M. (2004).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use of victim-offender mediation to redress criminal actions. *Journal of Health & Social Policy*, 18(4), 53-69.